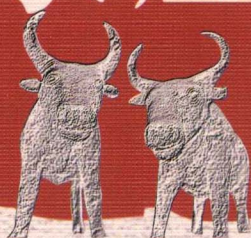


潘春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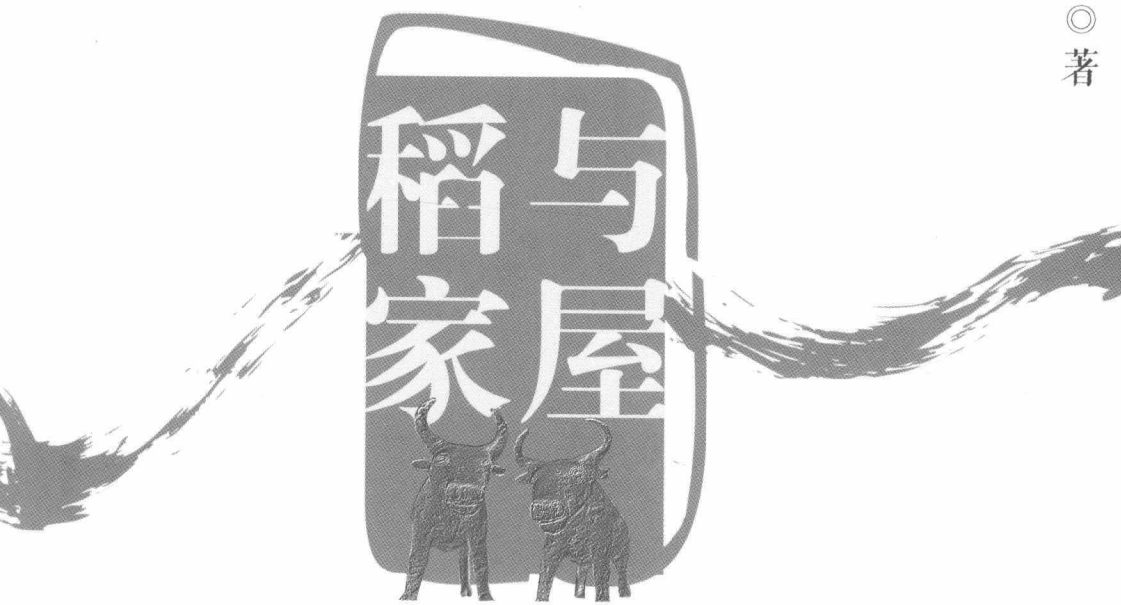
# 稻与屋 家



瓯骆与东南亚区域  
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潘春见◎著



瓯骆与东南亚区域  
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稻与家屋：瓯骆与东南亚区域文化研究 / 潘春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

ISBN 978 - 7 - 5203 - 1179 - 3

I. ①稻… II. ①潘… III. ①稻—文化—研究—东南亚②稻—  
文化—研究—广西 IV. ①S511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0085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 超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  
插 页 2  
字 数 459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目前，全世界约有1亿人口操壮侗语，主要分布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约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中约2000万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广西及云南、贵州、湖南、广东、海南，含壮、布依、傣、侗、水、仡佬、毛南、黎8个民族。约7000万分布于东南亚的泰国、老挝、越南、缅甸等国，包括越南的岱族、依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史学界、语言学界认为，这些操壮侗语的民族渊源于汉武帝之前的秦汉时期中国南方百越族群的重要支系西瓯、骆越，并由此称他们为瓯骆族裔。

瓯骆族裔自古擅长种植水稻，擅长建造木构聚落形干栏家屋。目前学界基本确认中国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华南—东南亚为重要的稻作起源区，确认“浙江河姆渡那样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木构村寨的居民，从公元前5000年时就在当地生活”<sup>①</sup>。确认“到距今8000年的时候，中国北方以小米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南方以水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都已确立起来了”<sup>②</sup>。这意味着水稻基因型社会制度和木构基因型聚落形态，为距今8000年前南方文明的主要景

---

① [澳大利亚] 彼得·贝尔伍德等：《史前亚洲水稻的新年代》，陈星灿译，《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②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史前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0页。



观基因图谱，瓯骆文明也不例外，由此形成的瓯骆与东南亚共有的文化质点，使稻与家屋的互动进化史，同时也成为中国—东南亚史学人类学互动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称家、房子为“兰”（ra: n<sup>13</sup>），称稻田为“那”（na<sup>31</sup>），称村落为“板”“版”“𠵿”“𡩇”（ba: n<sup>33</sup>）。在他们言语与象征的思维结构中，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持续进行的“那”的开垦、灌溉、耕耘及其稻米产品的加工、饮食、交换是稳定的居所“兰”获取生计来源及保持其延续性的前提。而人们持续进行的“兰”的建造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板”“版”“𠵿”“𡩇”的聚落形态，是“那”得以向垌—勐—家—国—天下演化的本土化途径。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权力与资本的运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那”与“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而展开的，而“那”与“兰”的互为“捆绑”或“二元对立”及其不断进行的隐喻和换喻的社会文化创造，不仅使瓯骆关于世界体系的本土化表达既表现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垦那而食，依那而居”，同时表现为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以“那”为本，以“兰”为组织模式的稳固的社会体系。

半个多世纪以前，著名民族学家徐松石先生注意到广东广西的大量“那”地名文化现象，并在其著述的《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发出“广东台山有那扶墟，中山有那州村，番禺有都那，新会有那伏，清远有那落村，高要有那落墟，恩平有那吉墟，开平有那波朗，阳江有那兵，合浦有那浪，琼山有那环，防城有那良，广西柳江有那六，来宾有那研，武鸣有那白，宾阳有那村，百色有那崇，邕宁有那关，昭平有那更，平南有那历，天保有那吞，镇边有那坡，这那字地名，在两广汗牛充栋”的感慨。另外，他还研究发现：“据泰国史书所载，小泰人的一部分自滇边十二版纳（版纳即村意，那即田意，版纳即田村意），到了泰北，他们创立一个兰那省，

不久又创立一个兰那朝（‘兰’即‘屋’，‘那’即‘田’），兰那即田屋意。田屋和田村这两个名称是何等的一贯！当时的小泰人必有异常高尚的农作文化。……现在，泰国那字地名多至不能尽举，尤其是沿小泰人入境的路线，那字地名更多，例如那利 Na-li，那波 Na-poue，那当 Na-then，那地 Na-di，那何 Na-ho，那沈 Na-sane 等，这都表明泰国地名与两广地名的联系，泰语倒装，那何即是何田，那坡即是坡田，并提出那的最早开拓者骆越人曾祖居并建都中国郁江平原和越南红河平原，即‘骆越国，一说都今广西贵县，一说都今越南东京河内’的见解。”<sup>①</sup>

可见，泰国北部曾在历史上建立过一个强大的以“那”（稻田）和“兰”（家屋）为政治学深意的“兰那”王国。结合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本义为“十二村田”，壮族的《布洛陀经诗》几乎每一篇章都反复出现造兰造那的诗句，壮族经典情歌《嘹歌》有著名的《建房歌》，壮族花山壁画实是瓯骆最大的“那”文化符号“蛙神”图像，等等，我们不难发现，“那·兰”自古就是瓯骆及其后裔壮侗语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脉之所在，自古就是南方壮侗语民族及其东南亚的同根生民族所共同拥有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

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关注“那”而少关注“兰”，多从地名学、语言学、遗传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角度考察“那”的文明起源和文明传播路线，却很少从“那”的文化表达角度考察其文明的特质与结构，很少从其特定的社会政治学意象或文化符号意义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政治学概念下的规则或逻辑。而事实上，“那”和“兰”或“那兰”都不仅是特定的物质文化现象和精神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族群自识的标志和历史认同的符号，是一

<sup>①</sup> 《徐松石民族学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6—257、346 页。

个以“兰”为居，以“那”为食的民族文化集团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历史记忆和最新梦想，是凝聚他们的情感和心灵，发出他们历史与时代声音的言语和象征。

本书认为，瓯骆文明中的水稻基因型和木构聚落型的“社会—空间”表达，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具有地理景观学特征的“那”和“兰”的相互转换而实现的。“那·兰”为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生活世界与世界观体系的本土化表达，“兰”的聚落形态及其体系与“那”的聚落形态及其体系密切相关，由此构成的“兰”和“那”的结构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瓯骆社会结构的社会—空间表达，或瓯骆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进化的时空表现。其中，作为社会—空间的表达形式，“垌”“勐”的社会结构形态及体系最初是通过“那”的生产与经营而延伸发展出来的社会政治学概念，基本含义是家—家业—家园—家国。而在这些社会政治学概念中，“稻田”“房子”即“那”和“兰”既是其中最基本的语素和文化单元，同时也是“垦那而食，依那而居”的生计手段和社会文化创造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由于才疏学浅，笔者的研究还有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关注和批评。

# 目 录

第一章 “广谱革命”：“那·兰”文明的最早演化场 ..... (1)

第一节 广谱革命·贝丘文化·那的文明共生 ..... (2)

第二节 广谱革命·定居生活·家屋的文明共生 ..... (28)

第三节 “那”：瓯骆大地上冉冉升起的第一缕文明曙光 ..... (39)

第四节 自成体系的“水—那—兰—板— $\left\{ \begin{array}{l} 垌 \\ 勐 \end{array} \right.$ —家—  
国—天下”稻作农耕文明体系 ..... (53)

第二章 瓯骆故地一个大型壮族村落稻与家屋的人类学考察 ..... (72)

第一节 稻与家屋的“空间—社会”秩序 ..... (73)

第二节 “那”与家—国的互动演化 ..... (111)

第三节 稻与家屋、生命的互动演化 ..... (163)

第四节 稻与家屋的社会结构与亲属称谓制度 ..... (197)

第五节 通过“二分统合”建构“中心型社会” ..... (235)

第三章 犀牛·稻·家屋：建构安全的生命共同体之舟 ..... (253)

第一节 瓯骆自古是犀牛栖息的家园 ..... (254)



|     |                         |       |
|-----|-------------------------|-------|
| 第二节 | 瓯骆最早的牛图腾崇拜对象：犀牛·····    | (268) |
| 第三节 | 犀牛独角的神徽化：稻与家屋的安全之舟····· | (293) |
| 第四节 | 瓯骆的布山古城曾是一座犀牛王城·····    | (310) |

#### 第四章 稻米文化合作推进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

|                        |       |
|------------------------|-------|
| 研究                     | (371) |
| 第一节 郁江北岸壮族农村的稻米文化      | (372) |
| 第二节 稻米文化合作推进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 |       |
| 研究                     | (423) |

## 第一章

# “广谱革命”：“那·兰”文明的 最早演化场

西方学界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距今约 1 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其标志之一是人类学会驯化、栽培农作物和饲养家畜；标志之二是人类开始由狩猎采集的动荡不安生活走向早期农业村落的定居生活。前者为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奠定物质基石，后者为文明实体城市、国家的兴起提供前提。在这一文明进程中，远古生活在中国珠江流域的古越人，是世界上最早掌握水稻栽培技术的族群之一，他们中的重要支系西瓯骆越人“垦那而食”“依那而居”创造的稻作文明，惠及今日全球 113 个国家一半以上人口，创造的“干栏”系房子，历史上广泛分布于中国长江以南直至东南亚的广大地区，至今在中国—东南亚的瓯骆遗裔壮侗语民族中继续得到延续和使用。

由于水稻种植为瓯骆人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前提，干栏建筑又因适应稻作农耕经济对自然地理环境和亚热带气候特点的要求而经久不衰，因此，随着稻与干栏家屋的文明演进，一种既溯源于“那”又先导于“兰”的文明特质被注入了西瓯骆越的民族原型和国家雏形，并自成一体地成长为与其他区域或族群迥然不同的文化因子或文化大树。这一文化因子或文化大树因扎根中华文明的土壤

而成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宝库的耀眼明珠，同时又由于文明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而惠及东南亚。

## 第一节 广谱革命·贝丘文化·那的文明共生

“广谱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由西方考古学家弗兰那利（Flannery）提出的关于史前人类与动植物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且这种变化有可能导致食物生产的开始，农业的起源的一种假说。该假说认为，约2.3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最盛期来临之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为缓解环境和人口的双重压力而主动拓宽取食资源的范围和途径，许多以前未被注意或重视的动植物资源，如野生谷物、水生软体动物等被人们用于日常生活——即人类食谱的广谱化，同时伴随的现象还有狩猎、食物加工、食物储藏等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所居住空间利用的日益复杂化等。<sup>①</sup>

而考古学、文化学的研究表明，曾在全球广泛兴起的“广谱革命”在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取得了两个方面的主要显著成就：一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以采集螺蛳、蚌类等水生软体动物和捕鱼狩猎为主要食物来源的贝丘文化的繁荣；二是由广谱采集而催生的野生稻的被食用、被驯化和被栽培，成为后来被柴尔德定义的“食物生产革命”（Childe, 1936），怀特定义的“最初的，伟大的文化革命”（White, 1959），布雷德·伍德定义的“农业革命”（Braid Wood, 1960）等的重要前奏。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与水生动物多样性的生态型经济和广谱采集于“水”的生计手段密切相关，并很可能是后来该区域具有文化类型

<sup>①</sup> 柯济：《我古生物学家揭秘广谱革命》，《光明日报》2012年2月14日第12版。

学意义的巢居干栏这一建筑类型得以产生、延续和发展的原型动力。与此同时,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发现,农业引入前的冰后期中石器时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发生了食谱上的大型动物灭绝、水生动植物资源生长繁茂的适应性变化,由此带来的对水生广谱资源的强化开发使该地区的贝丘文化蓬勃发展,并很可能导致了野生稻的被发现、被驯化和水稻栽培技术的出现。

### 一 广谱水生资源的强化开发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古人类的适应性变化

环境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由于全新世以来全球气温升高,冰川融解,海平面上升,距今14000年左右出现海水大量涌入内陆的“海进”,在海进的同时,大量贝类、鱼类等海洋生物伴随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进入内陆的江河湖泊,为人类以捕捞水生软体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广谱采集的生业变革提供了前提。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敢为人先的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人类,纷纷从洞穴林野走向附近的溪流湖泊捞食蚌螺、鱼虾等贝类水生生物为生,他们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率先变革“陆事”生计为“水事”生计,变革“洞穴人”为“贝丘人”的人群,并在“水事”生计风生水起中推动贝丘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原来的洞穴林野文化场向江河水滨文化场的变革与发展。

#### (一) 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古人类在中石器时代创造的贝丘文化

贝丘文化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以包含大量古代人类食余抛弃的贝壳堆积为特征,考古学专用名词“贝丘遗址”,日本学者称“贝冢”,西方学者称“庖厨”,广西壮话叫“dingzsae”“pyozsae”“diegsae”,汉译叫“螺蛳山”“螺蛳地”,这些称谓虽不尽相同,但指的都是原始人类以采集螺蛳、蚌类等水生软体动物和捕鱼狩猎为主要生活来源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文化遗存。

这类文化遗存在我国长江以南到东南亚等亚热带地区的分布以江河畔及附近山洞、海滨为主要分布区。比较著名的有广西邕宁顶蛳山、江西岸、敢造、豹子头、长塘、西津、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柳州白莲洞、平果城关、芭勋、桂平牛尾岩、防城亚菩山、马兰嘴等；广东高要蚬壳洲、增城金兰寺下层、佛山河宕、南海灶岗、南海西樵山等；福建黄瓜山、昙石山、庄边山、溪头等；云南洱海银梭岛以及东南亚越南的芒康、达昂、崩洞、保卓、琼文；老挝的坦邦；柬埔寨的拉昂斯边、三隆森；泰国的仙人洞、翁巴洞；马来西亚的瓜克帕、武吉朱平、瓜扎、瓜克奇尔；等等。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中国南方至东南亚的古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懂得食用蚌螺类水生资源，如广西白莲洞西4层下部距今  $26680 \pm 625$  年的钙华板地层已出现螺壳，表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古人类早在距今 2.6 万年前就已经开始捕捞蚌螺食用，而广谱强化开发蚌螺类水生资源，则到距今 15000—10000 年的中石器时代，如中国南方和东南亚考古发现的距今 15000—10000 年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均富含丰厚的介质堆积，主要遗址有：广西武鸣苞桥 A 洞、芭勋 B 洞、腾翔 C 洞、桂林 D 洞、东岩洞、来宾盖头洞，柳州市白莲洞中层（第二期文化）、柳江思多岩、陈家岩、崇左矮洞、鲤鱼嘴下层文化、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罗髻岩、南海西樵山及东南亚和平文化早期的泰国西北仙人洞一期文化、北碧翁巴洞穴 B 层文化、越南北部柯姆岩洞二期文化、马来西亚沙捞越尼阿洞穴遗址，等等。

这些遗址不仅出现的年代早，且持续时间长。如柳州大龙潭鲤鱼嘴贝丘遗址下层下部螺壳 BK82091，距今  $23330 \pm 250$  年，下层 PV379-1，距今  $21020 \pm 420$  年，下层 PV379-2，距今  $18560 \pm 350$  年，下层上部螺壳 BK82090，距今  $12880 \pm 220$  年（李松生，1991）。即使减去用贝壳进行的碳 14 测定所出现的偏早率年限，鲤



鱼嘴下层下部 BK82091 的绝对年代为距今  $19805 \pm 250$  年；下层上部 BK82090，距今  $10850 \pm 220$  年；<sup>①</sup> 广东独石仔遗址下文化层烧骨 BK83018，距今  $16680 \pm 570$  年，中文化层上部烧骨 BK83016，距今  $14260 \pm 130$  年，上文化层螺壳 BK83009，距今  $13320 \pm 130$  年（邱立诚等，1988）；湖南朱家岩遗址，贝壳 BK83019，距今  $17140 \pm 260$  年（广东省博物馆，1990）。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泰国甲米府摩桥洞遗址第三层文化碳 14 年代为距今  $11020 \pm 150$  年、 $10530 \pm 100$  年、 $10470 \pm 80$  年；<sup>②</sup> 属于中石器时代的越南“和平文化”早期遗址越南省海洞的碳 14 年代距今  $10870 \pm 175$  年，被认为是和平文化变种的北山文化出现的磨刃砾石工具，距今 10000 年。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中石器时代的洞穴贝丘文化均出现在绝对年代距今 1 万年甚至 2 万年，延续时间长达万年左右。

除此以外，这些遗址中的古人类还同时具有喜居洞穴，喜食蚌螺鱼等水生生物，曾普遍使用大石器，但已出现石器工业技术的钻磨变革，狩猎对象基本为现生种，无陶等极为相同相近的文明特征。如何乃汉、覃圣敏总结的岭南中石器时代遗址具备的五个方面的共同特征是：（1）均分布于石灰岩洞穴中，相对高程都在 20 米以下；（2）文化堆积均属“含介壳的文化堆积”；（3）文化遗物绝大部分为石片和简单的打制石器，部分遗址还有少量仅刃部磨光的切割器和凿打加磨的穿孔砾石等，但无陶片共存；（4）动物化石均为现生种，人类化石均属新人类型；（5）经济生活均是渔猎和采集，绝对年代距今 10000 年左右，属地质年代的全新世早期。黄春征总结的越南中石器时代“和平文化”的共同特征是：（1）遗址均分布于石灰岩洞之中；（2）文化层堆积含大量螺壳，实属洞穴中

① 何乃汉：《广西贝丘遗址初探》，《试论岭南中石器时代》，《考古》1984 年第 11 期。

② 覃圣敏：《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 1 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7 页。

的贝丘堆积，它们和灰黄色不甚胶结的旧石器晚期堆积不一样；（3）在文化堆积层中的动物群都是现生动物，没有达到化石程度，在那儿没有发现猩猩、熊猫和剑齿象的化石；（4）文化遗物，大部分为单面打击的砾石石器，器形比较稳定，主要类型有长型斧、短型斧、杏仁型斧、圆形器和磨盘、臼杵，另外还有一部分磨刃斧和磨光骨器。两相比较发现，两者大同小异，对此，学界早已形成共识，如有学者把两者看作“实属同一文化区域”<sup>①</sup>或“广阔地域内分布的同一系统同一类型的文化”<sup>②</sup>。

当然也有学者根据石器文化的细微差别如中国南方钻、磨石器出现的年代早于东南亚钻磨石器出现的年代，如柳州白莲洞二期文化、鲤鱼嘴和独石仔的下层文化出土了距今 17000 年左右的钻磨石器，而东南亚较早出现的缅甸巴登林遗址出现的磨刃石器和穿孔石器距今只有 13000 年左右；马来西亚沙撈越出现的磨刃石器距今也只有 12000 年左右，均晚于中国南方的同类石器。与此同时，中国南方中石器文化中存在西樵山文化类的典型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而东南亚目前还没有发现此类细石器，东南亚中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骨角器、蚌器数量较少，而中国南方中石器文化中则大量出现骨角器、蚌器等，认为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中石器文化应各有各的自身发展序列，并构成一种非平行的发展关系所致。<sup>③</sup>

然而，不管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共性有多大，差异性又如何细微难辨，但基于山水相连、气候相近等自然因素及为觅食而不得不迁徙流转而产生的文化交融等，中国南方和东南亚

① 张光直：《中国南部的史前文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0 年，第 42 本第 1 分册。

② 戴国华：《论东南亚“和平文化”及其与华南文化的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1988 年第 1 期。

③ 谢崇安：《岭南和中印半岛中石器文化的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0 年第 3 期。

考古学上的历史关系，事实就如尼古拉斯·塔林在《剑桥东南亚史》(I)<sup>①</sup>第二章《史前东南亚》的注解①中指出的一样：“不提到中国南部，就不可能理解东南亚史前的后来进程。”或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奇先生关于中国考古文明的区域划分一样：“中国考古学文化所划分的六大区系中，广义的北方中的大西北联系着中亚和西亚；大东北联系着东北亚；东南沿海和中、西南地区则与环太平洋和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有着广泛的联系”<sup>②</sup>，而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在贝丘考古文化上的整体性特征，虽然只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整个考古文化区域性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此已充分说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古人类在中石器时代的广谱经济开发过程中，都曾共同以水生贝类、鱼类等水生资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并由此创造了具有区域性整体特征的贝丘文化。

## (二) 贝丘文化曾如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人类文明的路口

从目前我国对广西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研究情况看，广西东起浔江、郁江两岸，西至那坡、大新，南至北部湾，北至灌阳、全州的大部分地区，发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或遗物分布点100多处，古人类化石10多处，分别是甌皮岩人、宝积山人、荔浦人、灵山人、柳江人、鲤鱼嘴人、麒麟山人、白莲洞人、九头山人、都乐人、甘前人、干淹人、九楞山人、隆林人、定模洞人等。这些早期原始洞穴聚落有些生活在距今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些保留到商周时代，甚至更晚。如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发现的柳江人距今5万年，来宾兴宾区麒麟山盖头洞发现的麒麟山人距今2万至3万年，甌皮岩遗址，最早年代距今

① [新西兰]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I)，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② 苏秉奇：《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1页。

12000 年以上，晚期距今 7500 年左右，人类在此居住 4500 年；柳州白莲洞遗址，最早年代距今  $37000 \pm 200$  年，最晚年代距今  $7080 \pm 125$  年，人类在此居住 30000 余年。而广西先民“随山洞而居”（《隋书·南蛮传》）、“以岩穴为居止”（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历史记载曾不绝于唐、宋史册及神话传说，且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广西忻城县还有部分壮人在村边山脚下的宽大干燥、冬暖夏凉的岩洞里居住。21 世纪的今天，广西上林县塘红乡龙祥村下敢庄，还有一个特别的“岩洞村”，在这个岩洞村内，有一个樊氏家族在这里生活了 160 多年，繁衍了 8 代 100 多人。

研究表明，远古那些依山洞而居的广西古人类，虽然一开始便选择在距当时河口不远的洞穴中生活，但在中石器时代以前他们的生计却主要是“陆事”生计。如桂林宝积岩、田东定模洞、柳州白莲洞 1 期文化、柳州鲤鱼嘴第 4 层文化，均是目前可以确认的岭南地区更新世晚期的文化点，都具有：（1）均是石灰岩溶洞或岩厦，洞口向阳，附近有河水或地下河经过；（2）在绝对年代上，除了鲤鱼嘴的时代稍晚些外，其余均在距今 30000—18000 年之间；<sup>①</sup>（3）与遗物伴出的动物化石均出现更新世晚期的绝灭种属：剑齿象、巨貘、中国犀、巴氏大熊猫、最后斑鼠狗、犀牛、南方猪等化石；（4）除了更新世晚期绝灭种属的动物化石外，还出土猕猴、金丝猴、貂、果子狸、狐、蝙蝠、野猪、水牛、羊、斑鹿、赤鹿、秀丽漓江鹿、豪猪、水鹿等当属人类食后残渣的大量现代动物种群化石；（5）罕见软体类螺蚌等水生动物化石，如碳 14 年代（B. C.）为  $19645 \pm 200$  年的白莲洞西 7 层和介于“柳江人”和“麒麟山人”之间，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稍早阶段，碳素测定其年代为距今 24760—35600 年的宝积岩甚至没有发现。这些共同点表明，距今

① 参见焦天龙《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岭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考古学报》1994 年第 1 期。